

●主持人语



江南三月，不但没有看到淅淅沥沥的小雨，反倒听到了阵阵雷声，未到惊蛰便惊蛰；乍暖未尝，春寒倒灌。身边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我也长期处于精神萎靡之中，好在身边人主动来了两篇书稿，让我在疲惫中有了窃喜，也为偷懒找到了借口。

每一位图书编辑，即使是案头编辑，都会有一段与作者交往的难忘故事。故事有多有少、有浓有淡、有爱有恨。越是优秀的编辑，越是层级高的编辑，交往的作者就越多，与作者的故事就越多、越浓、越具爱意，甚至在爱到深处时会爱文及人，如同爱屋及乌；越是差的编辑，与作者的故事越寡、越淡，有时甚至充满恨意。我时常听到编辑对某位作者的含蓄

抱怨，也不断听到作者对某位编辑的强烈抗议。我在拙作《出版的正面》中曾援引本家名编辑徐俊兄对我说的一句话：“出版社多一位好编辑，就多一位好作者；多一位差编辑，就丢一位好作者。”

本期两篇文章和作为作者的编辑，他们出现了五个共同特点。一是同为凤凰集团编辑，这在《文艺报》“编辑故事”版中从未有过。作为本版主持人，一直不想向凤凰名编集中约稿，而是尽量动员全国各地的名编为《文艺报》撰稿，只想在突发稿荒时利用职务之便、用“强硬”手段征稿；二是同为总编辑。汪修荣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袁楠为译林出版社原总编辑，而袁则刚刚履新和我一同负责凤凰传媒的内容生产；三是

他们同为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自然写的都是与作家有关的故事；四是都是自来来稿。自来来稿和约稿的重要区别是：自来来稿是完成自己的心愿，约稿则是完成别人的任务；自来来稿汹涌而出，不写不快，因而充满真情和冲动，约稿则是“按时交作业”；自来来稿让我有意外之喜，而约稿则让我要时而兴奋（同意写稿），时而失望（催而不动）；五是他们写的都是文学大家：修荣所写李国文、袁楠所写格非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这让我觉得十分神奇。

修荣与李国文先生的交往充满了一波三折。从希望到失望再到希望再到失望（李先生不幸离世），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从编辑工作到生活再到家庭，从

信件往来电话通讯，真是跨世纪的忘年长交；袁楠与格非的交往时间不如修荣与李老生长，但从初识到相知，时间见证了他们真挚、深情的交往，以及他们忘我的长谈和成果的灿然。作为中青年女编辑，袁楠的文笔与修荣的细腻与深婉，自然与修荣和我完全不同，读者可以自辨。

作者、读者、编辑、评论者以及书商之间故事众多，虽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趣精彩，也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天长地久，但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故事，如果编剧和导演足够用心，或许可以拍出上百部令人柔肠寸断的《查令十字街84号》。

——徐海

我与李国文先生的忘年交

□汪修荣

由于年龄的关系，作为“60后”，在出版生涯中，我打交道的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老作家寥寥无几，李国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可以算是我的忘年交。

我与李国文先生的相识，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集热。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一系列青年作家文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年作家文集出版热，无论从出版规模还是从影响来说，在出版界都曾名噪一时。我个人先后责编过《池莉文集》《铁凝文集》《林白文集》《迟子建文集》《舒婷文集》《斯好文集》等六套青年文集。也许因为我编过多位作家文集，《池莉文集》又在热销中，有一天，社长告诉我，李国文先生希望在江苏文艺出版一套文集，想听听我的意见。论资历和影响，李国文先生无疑有出文集的资格，作为一个狂热的“文青”，我曾拜读过他不少作品，李国文先生的短篇小说《月食》《危楼记事》曾先后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曾荣获茅盾文学奖。当时少年气盛，便坦率地说，相比我们正在出版的年轻作家，李国文先生虽然是文坛老将，作品也很有价值，但作品可能多少有些“过气”，不太受年轻读者的欢迎，市场可能不太乐观。如果要出，要控制规模和定价，建议最多出四卷。相对于李国文先生庞大的作品数量，区区四卷，确实是太少了些。社领导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让我与李国文先生具体联系。

因为文集的事，我有缘与李国文先生相识，并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返，书信成了我与李国文先生沟通的主要媒介。出乎我意料的是，李先生居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甚至表示要精益求精，出三卷即可，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对于出我个人文集，一向持保守态度，因为看到前辈十卷八卷地出在那里，把什么东西都像出全集似的收了进去，令人产生一种寿终正寝的感觉，所以，有些出版社来联系，我不想以文集的名义，将写过的几百万字都编进去而婉拒了。况且，我时下也未有搁笔的意思，何必忙着做那些身后的事呢？再说，文章好坏，还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为好。对于你的建议，我真是很感激，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厚爱。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出一套精选的三卷本的文集，不知是否可以？上中下三卷，三十年代也有过这种先例的。我想，贯彻以精为佳的法则，一卷若以三十万字计，加起来，也有一百万字。据我所了解的目前还健在的作家，能有一百万字站得住的作品，也就是天保佑了……年轻人出文集，鼓励是第一位的，收进较弱的作品，说得过去。出中老年作家的文集，似乎应该严格些，有些作品可以存目，不必全收，而在精粹。不知以为然否？”（1998年6月21日），对他的意见，我自然表示尊重，合同很快便签了，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一切都按合同进行中，次年7月9日，不知何故，李先生忽然改变了主意，来信表示希望增加一卷，扩大到四卷：“友人的关心，我也很感谢的，总是一番盛情好意。为此，我想了一个两全的方案，原合同的三卷，增加一卷，为四卷，也符合你后来信中所说，不知尊意如何？”从信中意思看，可能是某个朋友建议他出四卷。不久，在7月21日的来信中，李先生又对文集的选文提出了新的建议：“四卷的安排，我初步想，不以原来的集子，而是以编年的方式。除去长篇小说，只选中短篇小说三卷，若每卷以二十五万字计，选七十五万字，若三十万字计，则选九十万，这就听由你的安排了。另一卷为随笔、散文，也是编年体，这样，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创作脉络，不知先生看法如何？”

显然，他的编选方式与内容与我原先的设计并不一致，也不太符合我对市场的定位，我自然委婉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从市场和读者考虑，我希望尽量收录他的代表作，同时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收入，这样作为文集才更有分量，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为此，我们之间多次书信交流。对我的意见，李先生并未直接反对，表示出文集是小事，也不用急，容我再考虑一下。不知何故，李先生很久没有回复，拖了很久，最终放弃了出文集的机会。李先生为什么最终放弃出版文集，我不便问，我猜最主要的原因也许觉得出版社的意图与他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形同鸡肋，也许他另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前后两年时间，联系了很多次，文集流产了，我多少有些失望。作为一个年轻编辑，能出版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文集，在我还是十分乐意的，但李先生选择放弃，我也只能尊重他的决定。这是我与李国文先生一次未遂的合作。也许当年少不更事，未能很好地处理作家、编辑和出版社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能换位思考，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多年后想起来，仍引以为憾，深感对不起李先生。

文集虽未出来，却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李先生并未因为文集合作未成而不悦，此后我们反而频繁地交往起来，相与甚欢，渐渐成了忘年交。之后，李先生从未提及当年文集未能出版的事，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李先生为人仁厚的地方，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胸襟与人格。

那时电话尚未普及，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以书信为主。那段时间我刚刚经历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以我当时的资历和条件，完全可以分到一套主城区新房，却因种种原因只分到紫金山下一套二手房，与主城区隔着一个广阔的玄武湖，当时算是偏远的城郊。那年儿子刚上小学，本来朋友帮忙在主城区介绍了一家名校，考虑到新居离校路途遥远，没有人帮忙，自己上班接送也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割爱。每每想起，心里多少有些耿耿。有一次在信中不经意地吐槽，发了几句牢骚，不久便接到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



中宽慰我：“从来信得知，为孩子、搬家事忙，这都是人生必修之课程。一旦你到了我这已经下课的年纪，想忙也无从可忙了。”接到李先生的信，既惭愧又欣慰，心里忽然轻松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李先生的安慰一直铭记在心，温暖至今。

与李先生相识几年后，我担任副总编辑，负责书里的选题组织与策划，因为组稿的缘故，与李先生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我策划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都得到了李先生的大力支持，分别收入了李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桐花季节》和散文集《历史的真相》，这两套书都产生了较大反响，也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

李先生成了我的重要作者，每次开口组稿，他都慨然允诺，从不提条件，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顺利，也十分愉快。每到北京出差，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尽可能到李先生家登门拜访。李先生住在西城区西便门外大街西里单位分配的老小区的一栋居民楼，房子年代有些久，室内陈设简单，也并不十分宽敞，简朴中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书香。李先生身材魁梧，一脸慈祥，既豁达，又善解人意，令人如沐春风。虽然隔着三十年的岁月的鸿沟，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与李先生的交往，在李先生面前，我也没有什么顾忌，无论说什么，他都并不以为忤。在他面前，我完全没有在其他老作家面前的矜持与拘谨。有次，我当面郑重地请他写一部自传，我想以他的经历、地位，写一部自传肯定很有价值和影响，但李先生非常客气而委婉地谢绝了。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只是说他不爱写。我想，他不想写一定有他不写的理由，我只能表示尊重。也许对他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自传。

考虑到李先生年事已高，自己也杂事缠身，工作之外，平时并不敢过多地打扰他，每逢传统节日，比如中秋、春节，我都礼节性地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隔着遥远的距离，都能听到他声如洪钟的特别的笑声，开朗，达观，令人快慰。

李先生晚年喜读历史，写下了一系列非虚构历史文化类散文，影响广泛，读者无数。有次上门拜访时，他特地送我一本厚厚的《天下文人》，并在扉页上十分客气地写下“修荣先生指正”，虽是客气，却也反映了老派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

高龄时，李先生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历史文化类散文随笔，熔历史、文学、思想于一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表示希望从这类文章中选编一本有代表性的散文随笔，他欣然同意，把权力完全下放给我，由我自己选编，这便是后来的《血性的失落》，精装，雅致，读者和市场都反应良好，李先生对此十分快慰。没想到，这本小书竟成了我与李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

前几年，李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不时有些短文见诸报刊。鉴于《血性的失落》的成功，我曾当面表示希望把他在报刊上零星发表尚未出版的一些散文随笔搜集起来，出一本真正的新作。他欣然答应，表示新写的文章还不多，等凑够一本就交我出版，我一直期待着这本真正的新作，然而这一愿望终未能如愿。

去年春节，按惯例往李先生住宅打电话，想给他拜年，问候一下。以往电话一响，很快便能听到李先生响亮的嗓音，但这次，一连打了七八次，甚至十次以上，也无人接听。隔一段时间，又陆续打了几次，依然无人接听。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现象。家中无人，我以为他也许到外地休假，或到子女家去了。隔一段时间，又陆续往李先生家中打了几次电话，依然无人接听，我隐隐有些不安，于是便托北京的朋友打听，不久，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李先生已于2022年11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93岁。那段时间人们的关注点都在与疫情有关的各种消息上，所以李先生这样一个著名作家病逝的消息，也就被各种信息淹没了。想到李先生家无人接听的电话，想到李先生乐观、爽朗、洪亮的嗓音，不由一声叹息。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书比人长寿。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

引子：

那天，同事发来格非老师赠送四年的全新长篇《登春台》的宣传文案。

“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于千万命运中，我们推开自己的门。”

故事聚焦1980年代至今四十余年漫长时，沈辛夷、陈克明、奕宝庆、周振遐分别从江南碧溪村、北京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来到北京春台路67号。他们四人的命运流转在这里轮番上演又彼此交叠。他们从无序偶然中走来，在时间的湍流中前行。他们的故事是无数微弱颤动中的一角，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我们离开地面，回望时代。仿佛有什么隐含逻辑，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

我，一枚格非作品《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望春风》《登春台》的责编，仿佛等了很久这部新长篇，仿佛一直在等它。

这样的等待，或许起源于格非写作《登春台》时，说他将写出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作品的那天，起源于那些跟随他拆解探幽《金瓶梅》的神妙日子，起源于读到《望春风》结尾欲泪还休的那一刻。

也许，还源自很久以前，捧着刚刚做出来的雷蒙德·卡佛《大教堂》去清华找格非老师讨教的那年。说起来有趣，很多曾热心为译林社外国文学作品撰写评论的作家学者，后来都成为我们重要的原创力量。

时间的风霜中，哪怕十年二十年，有些人并没有什么改变，譬如格非。沉思略显严肃的神情，斑白的两鬓，深蓝色毛衣，硕大的黑色双肩包，从最初见到他起，就这么刻写在了十余年的记忆里。

刻在记忆中的还有关于名作的讲论。作为著名文学教授和外国文学资深读者，格非老师有相当大的阅读量，他对作家作品的剖析鞭辟入里而颇为独特。对译林社多年来出版的卡尔维诺、奥兹、巴恩斯、卡佛等作家，他多有精彩点评；译林社所出版的学术讲稿《文明的边界》中，他选择了麦尔维尔、穆齐尔和志贺直哉三位作家来讨论，他们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都试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在格非的“剥洋葱”下，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到《没有个性的》《白鲸》，其实，也是在更加切近地理解到格非本人。他遴选的作家站在“最后之人”的基础上，回望整个文明进程，这何尝不是他本人向着未来的一种眺望呢？

更多记忆片段，当然是关于我责编的格非作品。做《雪隐鹭鸶》，跟作者讨论书里涉及的诸多历史地理细节，饶有兴味、妙不可言；请“最美的书”设计大师朱赢椿做白底凹凸封面，腰封是玫瑰线描图，铺陈旖旎与荒凉。接着做《望春风》，格非老师说写这本书的念头源于他一次陪母亲返乡，在熟悉又不再熟悉的荒地上百感交集地坐了两个多小时。这是站在时间高岗上对历史的文学回应，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迸发出充沛的力量，让编辑在看校样的过程中不时感喟唏嘘；谈到封面时，格非老师说，书里有二十多个人物，会不会需要热闹些？最后请陆智昌先生设计的《望春风》，却全然是个简约的存在。作家和我在七八个方案里选择了同一个。带灰度的蓝绿色底，大片写意涂抹的鹅黄嫩绿，宛若春风拂柳；更重要的是，简洁灵动的排布指示着小说家的态度：置身时间长河，无奈却憧憬，虚无而希望。腰封上有一朵云状的白色，过了一天，格非老师说，他的朋友们觉得设计很好看，那条白色显得独特。出版数月后再看，凸显出纸张细密纹理的白色区域留下了诸多想象空间，丰腴而瘦瘠一分，似都有损这一空间的恰到好处。对他作品装帧格调的认定，似乎就是从那时打底的。在《登春台》，题材转向了都市日常经验，继续对人的群像进行广泛精微的考察，关注并探求现代文明带来的挑战、现代人的情感归宿与命运走向，我们讨论人物情节、讨论逻辑结构、讨论整体设计，也讨论怎样让它走到读者心里。

《雪隐鹭鸶》《望春风》到《登春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格非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废名的桥水树梦。百转千回的乡愁，对文明的忧思与寄望，平静之下隐秘的不安稳与悲剧感，古典传承和现代性奇妙融合，出离个体经验的哲思性写作，在格非其人其文，都是一脉相承的吧。

说《登春台》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它充分

带我「低头便见水中天」的作家

□袁楠



呈现出一位一流的智识作家演绎世界和表达思想的方式，仿佛浓缩了他几十年来凝视和解剖现代文明的观念史。一方面，在人物与情节上高度凝练而有思辨性、象征性，另一方面，密匝细腻的手笔描绘依然丰满可感，活色生香的生活经验，对量子物理、物联网的孜孜探求，都仿佛在字里行间有所映照，令我感到格外亲切。非常重要是的其中的主人公周振遐，正是通过他，格非深切追问生命的意义难题。

有天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觉得周振遐的想法和美学，有一点您的影子呢？”“哈哈，你这么问，我很高兴。”他说。

其实我想说，远不止“一点”。事实上，《登春台》里周振遐对世界与人整体性的看法，他喜欢的古诗，他住所的雅致陈设和养育的“粉色达·芬奇”“夏奈尔”等等品种繁复的欧月，让我在令人极度舒适的文字里游戏时，眼前经常浮现出跟另一位年轻的责编小伙伴管小榕一起去宜兴，喝了很多杯单枞的某个安静的下午。

那天真是偷得半日闲。有点水汽氤氲的江南，四周几乎俱寂无声。我们坐在长长的桌边，小口啜饮清香乃至有些凛冽的单枞，手握发烫的杯子，聆听世间凉热；格非老师坐在对面娓娓道来，讲他和母亲，他和学生，听我们絮叨琐事，沉静而富有智慧。有很多次这样的闲谈，刻写在了记忆深处。他总是那么善解人意，对普遍人性与生活境遇的阐发很具启示意义，对讲述者的性格导致的命运，还是闲聊原生家庭的种种投射；无论是说起他们一家子喜爱的古典音乐和咖啡，还是开解寻常生活里令人烦扰的命题，对面的我——或许年轻的小伙伴也一样，即便不是醍醐灌顶，也时常被拨开迷雾，“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惊讶于一位当年的先锋写作旗手，兼具学者作家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洞察浮生烟火时那份体谅与豁达。他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

从宜兴那个下午起，我就一直喝着单枞，芝兰香、蜜兰香、鸭屎香，它的香气有点峻峭，有人会觉得不够温厚，于我，却蕴藏了一个饱满如许、回甘悠长的下午。

时常庆幸相遇这么好的作家，不用回避、烧脑，尽可以坦诚、默契。关于编辑和作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道：“在与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工作成效，因为密切沟通和情感共鸣，编辑以遇到这样的作者而深深欣慰并引以为职业中至高的乐趣”。

是吧。暮冬时节，格非老师参加译林出版社品牌盛典活动，言及他和出版社的故事，以及新作《登春台》，说到他写作过程中会有纠结和犹豫，然而他有信念要写下去，因为他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两三位他的责任编辑（小伙伴和我）在等待他，对他报以全然的信任”。

当时坐在台下，倏然感觉到职业和稿子闪闪发光，格非老师、白鲸、赵伯渝、周振遐，我和我们编辑，都在旋转着进入了高能的小宇宙。

这时一个微带南方口音的沉厚中音在说：“我们都是宇宙中一颗渺小的粒子，一刻不停地，微弱振动。”

说他天赋异禀也好，说他具有最独特的文学性也好，格非老师自言他“没有寻找价值，只是希望描述。因为每一代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寻找价值、指点价值并非必需。对更为深邃的时空的理解伴随着做书的历程，对人性与审美更多的体悟，则来自书与人。

“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梦的万花筒。”感谢格非老师的“描述”。

（作者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